

## 科学与人文

# 八股百年祭

胡作玄

**摘要** 本文回顾了八股的形式及内容,揭示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历代已对八股及其基础的空疏无用造成的思想僵化、脱离实际、人才空乏,特别是道德虚伪的风气进行多角度的批判,本文则强调八股是控制思想的有利工具,从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更是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形成了阻碍科学文化发展的壁垒。

**关键词** 八股 《四书》 《孟子》 科学精神

1905年9月,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实施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彻底废除,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八股也随即成为历史。八股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简称。八股文是一种文体,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时被严格规定使用。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格式,分成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破题用两句话读破题目的意义,承题承接其意义加以说明。起讲为讨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下面的部分,从起股到束股才是正式的讨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八股中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会成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到清朝,字数也有限制,从顺治时的550字到康熙时的700字,形式要求,十分死板。

八股文不仅形式上死板,在内容上也有严格规定。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以《四书》为多。作者必须按照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来阐述,不得越雷池一步。这就是所谓“代圣人之言”。

这样一来,应试的士子只需读标准的教科书,按照标准的教辅资料,参考各种范文读本死记硬背,碰巧了可以考中当官。如果屡试不中,往往成为一个废物。由于整个教育体制都是围绕八股来进行,很难指望它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因此,明清5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以及相应的教育体制是对人才的摧残,也是对人力极大

---

**作者简介:**胡作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浪费。其目的无非是通过高度思想控制来巩固专制统治。单从这点来看,这个目的可以说是成功达到。

值得注意的是,八股与科举不能随意地相提并论。通过八股文进行科举考试只是明清两代的僵硬措施,而以前 800 年的科举考试相对要宽松及实际得多。关于科举制度已有许多研究,而且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至少它对于出身寒门的士子指出了一条做官的道路。再说,即使考儒家的经典,也有允许学生发挥的地方。到了明、清两代,许多人只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或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当然也有“阴沉木”的头脑,以及愚忠愚孝的言行。我们很难想象 500 年的八股训练与先进的科学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也许这应该是我们从八股废除百年之后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 一 八股考试的核心——《四书》

比起过去的科举考试,八股考试的内容及范围有更大的局限性,它只有儒家经典,即《五经》与《四书》。

大家公认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六经》并非孔子所作。《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失传,其余合称《五经》。《六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许多争议,而且并非儒家所专有,先秦诸子百家都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可以看成中华文化的源头。它们之所以被看成儒家经典,只是因为孔子整理、删定过,并做成教本来解释、补充,称为“传”,后来有些也列入《经》的范围。由于儒家成为显学乃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六经》遂成为中国人尊奉的惟一经典。

与《六经》是公认的提法不同,《四书》则是朱熹(1130—1200)的独创。他把《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抽出,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合称《四书》,并编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明成祖让人编《四书大全》作为标准的教科书,由此《四书》远远超过《五经》,成为八股考试的重头戏。在这种情势之下,明清两代出版大量的教材、教辅读物,使得学子的思想完全局限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当中。

从《五经》到《四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缩影。孔子距今已经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在当时,正是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活跃,富有原创性。儒家不过是百家之一,其学说也不可能被尊奉为经典,成为“经”。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就已经有各种流派,战国时已有“儒分为八”的说法。孟子只不过是八派之一(另一派是

荀子)。司马迁著《史记》把孔子列为世家,而把孟子、荀子合在一起,称孟子荀卿为列传。说是孟子的列传实际上只有 100 多字,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为什么没有受到特别关注,这也是思想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孔子的权威地位,至少在儒家的地位没人能挑战,但其他人就不一样了。汉朝时,《论语》差不多已经是经书,《孟子》仍为子书,不过,它们都同“五经博士”一样,也设置博士来专攻。《孟子》到五代和宋初才被“封”为经,二程及朱子之后才被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高度。这里面显然官方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孔子的《论语》只有 12700 字,研究的人很多,其实他的思想比较集中,目的比较清楚。而《孟子》篇幅为《论语》的 3 倍,但奇怪的是两书题材相重并不多,特别使我困惑的是,很少有人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

孟子生活在孔子之后的 100 多年。有人说他是子思的学生(因此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实际上,他出生时,子思早就死了。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实际上,他与许多中国思想家一样,综合许多人的学说,加上自己的创新,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在当时也只是儒家八派中的一派。而且,他的核心思想——性善说,也是同儒家另一派荀子的性恶说是直接对立的。笔者以为,孟子与儒家其他人不同之处主要在左右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理想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态度。不管怎么说,孟子直接指出“民贵君轻”的说法,最厉害的则是“君主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使朱元璋气得要命,显然它是任何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如果君不好,则弑君只不过杀一“独夫”,这话当然也是皇帝不爱听的。二是他的养浩然正气,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少有的带阳刚之气的东西。孔夫子比他要随和的多,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懂得人情世故。孟子的凛然正气的确气势压人,直到现在仍然经常被人引用。例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舍生取义”(《告子下》),“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种气节被程朱理学发展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孟子的确培养出一些忠臣,例如文天祥、史可法等,可他们却变成清朝皇帝给臣下树立的样板,这也许就是孟子被封为“亚圣”的真正原因。

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二程也好,朱熹也好,讲的都是大道理,但背后的驱动力则是“学而优则仕”。虽然“内圣”取决于自己,可是“外王”却不由得你,首先要得到君主的赏识。孔子在这方面很不成功,饿过肚皮(绝粮陈蔡),走过后门(子见南子),还是不行。

孟子的遭遇表面上同孔子一样,跑了很多国家没有当上官,但是他受到的礼遇完全不能和孔子同日而语。孟子出行总是“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国家,国君赐他黄金,有时他还不要。也许只有一次,他说话太不好听,人家不供应,使孟子“绝粮”。说老实话,这也难为那些国君。孟子对待国君,“说大人,则藐之”,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然后是一顿居高临下的教训,谁受得了!当时的“士”之所以这样神气,恐怕是战国时期各国都比较重视人才有关。秦国最后能完成统一大业,显然与它能够吸收和任用各国的人才不无关系。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孟子可以说没当成官,一是由于君主都比较现实,要求解决眼下的棘手问题,而很少有人会真正去“施仁政”,宋王偃就是因施仁政而让楚国灭掉的。二是孟子有自己的原则,他曾经谈到当官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国君礼数周到,毕恭毕敬,满足他的虚荣心,其次要言听计从,而且还要马上实行,此外待遇好也是很重要的。此后,士人的待遇就没有这么好了。他们的小命捏在皇帝手中,自然没有那种讨价还价的本钱。相对来说,还是宋朝对文官比较宽松,人可能因言获罪,但还不至于掉脑袋,最多像苏轼,多次遭贬。这也许是宋代的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原因。到了明清,孔孟也好,程朱也好,都成了皇帝随心所欲的工具了。

朱熹把孟子的地位提高,又加入两篇文章《大学》、《中庸》。这样从历史上讲,完成了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道统一脉相传。而且从编排上讲,朱熹把《大学》放在最先,把《中庸》放在最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大学》只有1747字,主要是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就是“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概括了对士人学子的要求和理想。

读了《大学》之后,就可以在这个纲领指引下,读《论语》和《孟子》了。应该说,《中庸》是儒家主要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朱熹也承认《中庸》比较难读,可以放在最后,而且比起前面的三本书来,更理论化、哲学化。对其含义,至今学者仍有分歧,正如现在对《五经》中的《周易》、《尚书》、《仪礼》等的分歧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庸》是从《四书》到《五经》很好的跳板。它对后来的影响,恐怕更是观点方法上的,其中提倡“中道”、“中和”、“时中”,造成了折衷、妥协、苟安、消除问题的态度。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八股考试命题和答案的标准,是士子必读的教科书。注释中加进许多程朱理学的思想,使儒家思想系统化、教条化。而更有丰富内涵的《五经》,则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朱熹曾引二程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

《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这样一来,只追求功名的学子自然不会钻研更多的东西,而只找一些应考指南去死记硬背。即使得中,也未必知道经典的内容涵义,更不一定照着做了。

## 二 对八股的批判——各种角度

时至今日,多数人对八股均持否定态度。即使在当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八股,不过,他们的角度各不相同。其后,对八股的批判扩大为对科举制度、理学体系乃至君主制度的抨击,八股反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把它当成一个反面的名词,出现在例如洋八股及党八股之中,而对其实质反而视而不见,继续以新的面貌大行其道。

到底什么是八股的实质呢?说到底,就是形式主义,而且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先把形式由内容剥离,然后是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这种情况在明清实行八股制度 500 年间已经有许多人感觉到甚至说到了。在明朝越来越严格的八股文格式的限制下,读书人连必读的《四书》以及《五经》中的一经也不去读,只是背诵八股文的范本,然后照猫画虎地练习作文。在这种大潮的推动下,出版商当然只出版范本赚钱,学校教育只教学生如何应考。这样,就连文人所重视的正统学术也是一塌糊涂,更不用说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而这正是皇帝的意思。

不过,思想是个双刃剑。考中了当了官的读书人在碰到实际问题时,却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而专制王朝又少不了麻烦。有的人太认真,的确相信什么忠君爱皇朝那一套鬼话,灭了九族还不算,方孝孺被灭了十族!为了什么呢?皇帝自己的家务事,连《儒林外史》中也说,方先生实在是太迂了。另一类人,像杨涟、左光斗更是好样的,堂堂正正地反对魏忠贤,可以说是忠臣的楷模,可是,他更多的同事,却给阉党当孝子贤孙,甚至有一个大官给魏忠贤建生祠(谁说中国人缺少创造发明)日日祭拜。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在危难时期,闯王进宫,崇祯自缢,有人殉死,有人逃跑,有人投降,吴三桂则“冲冠一怒为红颜”。

满清以 1% 的人口,统治百倍之众的汉族,尽管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文字狱及八股再次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满清皇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早晓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夷换成“汉”罢了。他们也有创造,一是繁文缛节,典型的形式主义;二是贬抑人格,使人成为忠实奴才。读书人当了官以后最大的学问就是学会如何在官场里混,其核心内容是处理人际关系。人的复杂性比物的复杂性要大得



多,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多样性、易变性、对环境与条件的敏感性。精通这一道则要读中国古典中的另一套,法家、纵横家、兵家,尤其是史书中的种种经验,这一套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主线。从这个角度对八股的批判很多,其中比较突出也比较持久的是明末清初以明末遗民为主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以及其后对史学的提倡。其实历代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都能吸取点前朝失败的经验,例如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清朝严禁宦官干政。但这些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某些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还会冒出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人才的需要,感到八股误人子弟。魏源说八股“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林昌彝说“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可是要扭转这种做法又谈何容易。

总之,历代学者已经认识到八股及其基础空疏无用,造成思想僵化,脱离实际,人才空乏,而且重要一点是形成普遍的道德虚伪的风气,去做表面文章,读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孟子》和《中庸》极力提倡“诚”,遗憾的是,“诚信危机”至今难以消除。

### 三 八股是控制思想的有力工具

我们常称民国初年以前的社会为封建社会,这严格讲并不准确。周朝倒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秦始皇以后则是专制社会,或皇权专制社会。这种形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见,持续那么久更是绝无仅有的。西方有很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像法国到路易十四时(大约与清朝康熙同时)才成为典型的专制主义(absolutism),这从他的两句口号可以看出其特征:“君权神授”与“朕即国家”。但比起中国 2200 年的专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马克思似乎对他所谓的“东方专制”也感到十分困惑。这的确是中国一项非凡的创造。统一并治理如此广大的地域和人口在历史上可以说从来没有过,印度次大陆(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乃至阿富汗东北部)土地不到中国的一半,却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除了二、三百年局部的统一)。两汉、唐、宋都曾实现过长期的统一,而明清两代更是持续 500 多年。治理这样的大国不能不有其独特之处。

这里我们不去谈军事体制、官僚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具有中国特色的则是对思想的控制。中国没有其他文明的宗教,也缺少支持适当理论的哲学,中国思想具有相当大的独断性、不确定性,难以成为严密法律的基础。这样,中国思想只是

一些空泛的政治原则,不足以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恐怕这也是唐、宋两代思想相对活跃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明清两代在这方面的控制则要严苛得多。

专制制度的专制程度是有所差别的,但从秦始皇起皇帝毫无例外都是谋求自己长命百岁,本朝传诸万世。不过,他们都很清楚,这些只不过是神话。改朝换代随时可能发生,最好的期望也只是长治久安,不像秦朝、隋朝,二世而斩。尤其是明、清两代,完全缺乏过去大皇朝所具备的根基,因此更为关注制度的建设。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大的发明家。清代在很多地方沿用了明制,康熙、乾隆都曾经高度评价朱元璋,认为他是“千古一帝”。实际上,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中是最腐朽的一个,除了明太祖、成祖两帝之外,皇帝素质都很差,然而却能维持 277 年之久,回想起来,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太祖政策的威力。

朱元璋的政策完全与他的经历有关。朱元璋出身卑微,当过和尚、盗贼。元末的农民大起义的形势造就了他。他参加了一支起义军,然而他不像其他起义军那样,目光是蒙古人的统治,而是在自己这支起义军内部取代原来的首领以及同其他各支起义军打仗,最终统一南方。1368 年,他在南京称帝。这时,元朝已衰弱得不堪一击,很快被明军赶回老家去。朱元璋从一个要饭的变成了皇帝不到 20 年,这就不能不让他考虑到,别人是否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把自己干掉,更进一步,如何使大明天下长治久安?

朱元璋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多功夫。他的办法极多,集中起来就是把自己(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皇帝)神化,而把官员、士子(或文人、文化人、读书人、但不是知识分子,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贬低、奴化,任意惩戒羞辱(典型的是廷杖制度)。他制定《大明律》,创立锦衣卫(后来发展成为东厂和西厂),成为镇压任何不满的基础。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多次制造大案,滥杀无辜,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思想上,他大兴文字狱,消灭任何反叛思想的苗头。其实,明清文字狱大都反映统治者的阴暗心理,藉此使士人谨小慎微,整天关注在无聊的细节之中,战战兢兢,避免引来杀身之祸。朱元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治人如治水,单纯围堵是不行的,还要疏导,也就是给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八股。明之前,科举制度已施行了近 800 年,但八股取士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它颇有创新,关键词就是“限制”,它限制教材、限制内容、限制文体形式,其结果就是引导士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把他们的思想完全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有三个好处:一是士子与士子之间处于竞争的态势,他们永远是竞争的对手,很难联合起来反对皇权;二是士子如果得中,则感激皇上的恩典,死心塌地为皇帝服务,而考不上的也只能怪自

己书没念好,八股文没学到家,怪不得别人,多数士子只能再接再厉地考下去;三是八股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躯壳,即使当了官也只是供帝王驱使的奴才,当不了官则成为一个废物。这种通过控制人的活动来控制思想的做法是极成功的。它造成了明代腐朽政权的长期稳定。

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之所以能维持 267 年统治,除了加上满汉不平等的条件之外,完全沿袭了明朝思想控制路线,即文字狱与八股。清朝在思想控制方面更为彻底,一方面搜集图书,编纂《四库全书》,另一方面,大量焚毁图书,划定“正统”范围,从题材上限定学习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明、清两代不仅从地理上闭关锁国,而且从思想上闭关锁国。在这种情势下,既不能产生什么先进思想,又把外来的思想拒之于国门之外,促成整个思想的教条化和空洞化。尽管如此,要不是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仍可以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维持下去。从明初到清末 500 多年间,人口翻了三番,从不到 5000 万增长到 4 亿,还是照老样子生存与发展,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难怪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仰慕不已,甚至到了 19 世纪初,拿破仑还说:“中国是睡狮,不要惊醒她,以免让世界震惊。”归结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制度建设,尤其是通过八股文控制思想上的成功之处。

更有意思的是,《四书》与八股不仅对上层人物影响很大,而且渗透到了通俗文化之中,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教育黎民百姓。综观明、清的戏曲、小说,大都鼓励读者成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成为朝廷的顺民。他们的理想也不过是当官甚至做皇帝。有少数暂时的、局部的成功,如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乃至义和团运动,其思想基础倒都差不多:儒家道德、等级制度、邪教迷信、哥们义气。在这种顺民文化的浸泡下,的确形成了“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的局面。这也说明,清末如此腐朽,义和团反而成为慈禧的工具。就在那时候,有中国特色的两类小说大行其道:一类是公案小说,一类是武侠小说,它们成了更有力的控制思想的工具。

## 四 百年之后看八股

八股废止百年后的今天,难道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吗?我看,还多得很呢。

首先,八股制度在明清两朝实施了 500 多年,影响了整个中国,影响了几亿人,也影响了上亿的士子。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干一件事,的确是有史以来无比的创举。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对人才的大规模浪费,同时,也是对物质资源的大浪费。



宋朝开始的活字印刷到明清两代集中刊印这些教材、教辅资料以及八股范文,到如今竟是一篇也难以找到,即使找到,是否还有人愿意在这上面搞点“学术研究”,发掘发掘看看其中有没有新意。可以说,这五百年,90%以上的出版物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垃圾堆。中国历代也不乏从内容和形式上不太可取的文体和文章,例如六朝盛行的骈文,也称四六文,过分讲究形式雕琢,但即使这类文体,也能产生像王勃《滕王阁序》之类佳作传诸后世。惟独八股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无一可取。而且八股文的限制对于明清两代的学术文章也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八股限制思想,首先就扼杀有思想的文章。不仅文章不行,诗词也一样。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赶上《全唐诗》的80%以上,有几首为人称道呢?也许纳兰性德算是例外,可他究竟是有钱、有闲不必为应试发愁的人物。

有人说,八股考试推动人读书学习,使社会上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实际上,这种读书实在让人倒胃口。读书多少需要主动性和兴趣的,硬着头皮读很难读进去。当代公众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现在不像过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其吸引力远比读书为大。记得张天翼写的《包氏父子》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老包很为小包不爱学习烦恼,忽然有一天看见小包一本正经地在读书,心中暗喜,殊不知小包看的不是课本,而是……。现在的考试当然不能同过去同日而语,可是那种追捧“状元”之类的事又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丘成桐却发现,现在的高考竞赛、奥校出来的尖子不太懂数学,只是做题机器。可是,话说回来,谁又真懂数学呢?不过,这倒揭示过去的八股与当前各种考试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其实是一场“智力”竞赛,有人学得快,又赶上好机会就行,与真才实学无关,与能力无涉。

其次,八股束缚人的思想,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过去它在巩固专制皇朝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到今天,早就应该实现200年前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愿。这种情况不能出现,完全在于专制制度总面临两种挑战,一是合法性挑战,一是技术性挑战。明、清两代都碰到这种问题。有些国家靠宗教来保证合法性的要求,而中国只有天花乱坠的鬼话。孔孟之道实际上取消了合法性这个问题,一旦当了皇帝,照他的意志办就是,不必多问。碰到技术性问题,皇帝是需要动真格的,那就需要各种人才,但是皇帝还是希望手下无能一点。他们不能容许威权震主的臣下存在。明朝自毁长城,杀了于谦和袁崇焕。而清朝则是对他的有用人才不断地敲打,甚至贬官,如林则徐以及曾国藩。这样,即使想从技术上提高,其实也难。这从容闳从1872年组织四批幼童留学一事即可看出。虽然说,这100多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有不少人成才,但同时也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在培养“奴

才”的愚民政策方面没有任何松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八股这一套思想体制彻底扼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关键在于人以及他们成长的土壤。虽然我们也谈古代科学以及各种文明的科学,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还是自牛顿以来发展起来的对技术以及文化有重大冲击的科学。这种科学为什么没有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中国生长,是许多人研究的问题。不言而喻,科学发展有其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这些都和一种文明的特殊传统有关,其中人们的精神、思维方法与关注的主题是最重要的,他们是决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必要条件不一定充分)。只有这些方面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我们才能冠之以“科学的”美名。

前几年,各行专家讨论“科学精神”,也出了不少文章,可是却发现有些人在谈科学时也不太科学。这些恐怕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了。例如有人把敬业精神归入科学精神,那我想当公务员、当工人、当资本家也有许多人敬业,与科学又有何干?照这种逻辑,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等等也可纳入科学精神。更多的人把创造精神或创新精神归入科学精神,这也不妥。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求得真理或者找出事实真相,而不是去创造与发现真理或事实无关甚至相悖的伎俩。我想推动科学进步的精神有如下四个方面:探索精神(简单说,对世界有好奇心,它也是一种求知精神,科学总要问为什么)、开放精神(归根结底要学习、交流)、批判精神、求实精神。这里求知精神在于广泛探索与学习别人,这从一开始就同明清官僚反对“奇技淫巧”相悖。批判精神首先在于不迷信权威,更不迷信虚名和宣传,这同八股完全背道而驰。不迷信权威不等于逆反心理,反对一切,实际上目的不是在求真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明清八股文化从根本上没有这些精神,使得科学无从生根。从科学精神到科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其中的两个方面是重要的:一是有没有发展一种健康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中国也有许多学术争论,特别是孟子也慷慨激昂地批判杨朱、墨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从来也没有一个什么是正确的标准,再加上中国本土狭隘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现世主义,因此虽然积累了不少素材,终究变不成科学。二是关注题材太窄,郑和从技术上来说远高于100年后的哥伦布。哥伦布没别的,就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少算了1/4的里程,这出错误的喜剧改变了近500年的历史。中国也可能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个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关注这些问题,恐怕还要引来杀身之祸。事实上,皇帝早给你指出一条康庄大道:学八股。

到了21世纪,但愿新形式下的种种八股歪风尽快散尽。